

《補江總白猿傳》「年表錯亂」考**

陳 珪*

摘要

唐人的傳奇文名篇《補江總白猿傳》，文中影射的中心是一代書法巨擘、初唐名臣歐陽詢(557-641)，但因為「不題撰人」，作者究竟為誰人，遂成一千古疑案。無論如何，《補江總白猿傳》的中心問題是影射，而攻擊的直接對象，則不外乎是歐陽詢本人或是其子歐陽通。從這種含沙射影的筆法，足以肯定這一篇傳奇文在字裏行間，有所寄託。我們研究的中心是《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如何用「年表錯亂」的章法，作含沙射影的攻擊，探討《補江總白猿傳》中的史實與虛構。這一探討試圖運用跨學科的方法，從歷史分析文本。這種筆法在《補江總白猿傳》中的曲折運用，恰恰反映了作者撰寫該篇傳奇文時，自有其不足以為外人道的苦衷，必須煞費苦心，構造出一個烏有之境作為中介，來曲解現實。我們從「年表錯亂」現象中可以透視出，「幻設」作為傳奇文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如何在初唐間的寫作實踐中逐步確立的。

關鍵詞：補江總白猿傳、初唐、傳奇、年表錯亂、南朝史

一、緣起 《補江總白猿傳》「影射說」回顧

《補江總白猿傳》是初唐的傳奇名篇，一般認為，文中影射的中心是一

* 作者係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亞洲研究系講師(英制)

** 本文為作者從文學批評和文化歷史學角度闡釋初唐傳奇文的一系列研究中的一個環節，初稿曾在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 11 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 年 4 月於重慶)上以濃縮形式宣讀。又，作者對《漢學研究》的三位匿名評審人對本文初稿所提出的認真具體的修改意見，表示深切的感謝。

代書法巨擘、初唐名臣歐陽詢(557-641)，但因為「不題撰人」，¹作者究竟為誰人，遂成一千古疑案。歷代的批評家們，只好姑且把這位隱姓埋名的作者稱為「無名子」。²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中葉，才有大陸、臺灣和韓國的批評家們相繼推測這位「無名子」的真實身分，開始設法把他坐實為某一位初唐的歷史人物。

五十多年來，學術界對這位躲在幕後的匿名作者的真實身分有種種猜測，我曾將其大致歸納為五種代表性的說法。第一種說法以劉開榮為代表，產生於1940年代，認為這篇謗文大約出現在唐高宗武后朝，作於歐陽詢身後。³第二種說法源出張長弓，產生於1950年代，認為其作者是中唐新興的政治陣營中反對舊家大族的文人。⁴第三種說法為王夢鷗倡導，產生於1970年代，認為此文的直接攻擊對象是歐陽詢本人，而作者則可能是江總(519-594)的長子江溢。⁵第四種說法始自於韓國丁範鎮，產生於1980年代，認為此文的作者似為許敬宗(592-672)之孫許彥博，作於許敬宗去世以後，其時歐陽詢作古已久，謗文的矛頭指向他的兒子歐陽通(?-691)。⁶第五種說法為卞孝萱所提出，產生於1990年代，認為該文作者是褚遂良(596-658)手下文人，旨在直接攻擊歐陽詢本人。⁷以上各說，雖然結論大相徑庭，但幾乎都從同一角度肯定了《補江總白猿傳》的中心問題是影射，而攻擊的直接對象，則不外乎是歐陽詢本人或是其子歐陽通。

影射的根據，是歐陽詢的長相酷似猿猴。兩唐書本傳都記載，歐陽詢形容短小，「貌甚寢陋」，以至於當「高麗甚重其書」、「遣使求之」的時候，

1 《新唐書》藝文志 著錄於子部小說家，不著撰人。見宋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點校本)，卷59，頁1543。

2 陳振孫以為，《補江總白猿傳》「託言江總，必無名子所為也」，見宋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317。胡應麟也同樣以為，「《白猿傳》，唐人以謗歐陽詢者，詢狀頗瘦削類猿獠，故當時無名子造言以謗之」，見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2001)，頁320。

3 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初版、1956年修訂本)，頁62。

4 張長弓，《唐宋傳奇的作者及其時代》(上海：商務印書館，1951)，頁42。

5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四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頁186-187。

6 丁範鎮，《唐代小說研究》(漢城：成均館大學，1982)，頁56-61。

7 卞孝萱，《補江總白猿傳》新探，《西北師大學報》社科版，第3期(1991)，頁41-45、74。

「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⁸ 歐陽詢因形似猿猴，他與長孫無忌（?-659）互相嘲弄的逸事廣為時人所知。劉餗《隋唐嘉話》記錄了這個故事：

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謔。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曰：「索頭連背暖，漫襠畏此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⁹

歐陽詢醜陋的程度，大約絕對不同一般，不僅唐人筆記記載上述逸事，正史中也記載著許敬宗在皇后葬禮這樣肅穆的場合，見了歐陽詢竟會忍不住大笑，以至因此而被降職：

文德皇后崩，百官繚紆，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眾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¹⁰

但是，正史和筆記所載，僅至於指出歐陽詢形容短小而醜陋、貌似猿猴而已，並無任何人身攻擊的暗示。

《補江總白猿傳》的作意則似乎在於為這位書法名家的醜陋形容，捏造出一條理由。傳奇文的作者既欲含沙射影，就必要混淆歷史和虛構之間的界限，創造出一個無有之境，作為中介。¹¹ 於是，《補江總白猿傳》故事的背景，便設定在梁大同年間（535-546）的一次虛虛實實、恍忽迷離的南征平蠻之役當中。小說通過字裏行間的影射，把故事中的書法神童，說成是一頭神奇的南山白猿與歷史人物歐陽紘（538-570）的妻子經過獸交所生的遺腹子。在傳奇文的末尾處，那有神通的白猿曾預言，此子長大後：

將逢聖帝，必大其宗。¹²

8 五代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 1975 年點校本），卷 189 上 儒學傳上，頁 4947；又見《新唐書》 儒學傳上，卷 198，頁 5645。

9 唐 劉餗，《隋唐嘉話》（上海：古典文學，1957），頁 14。

10 事見《舊唐書》，卷 82 許敬宗傳，頁 2761。唐人著述中，除《補江總白猿傳》而外，只有關於歐陽詢外貌醜陋的就事論事的嘲弄，從未見有關於歐陽詢為猿猴所生的謠言。無怪乎陳振孫推測，《補江總白猿傳》作者之所以「託言江總」，是為了「遂因其嘲，廣之以實其事」，同註 2。

11 關於影射問題的研究，參拙作“‘Shooting Sand at People’s Shadow’: *Yingshe* as a Mode of Representa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Monumenta Serica* 47 (1999): 169-207.

12 《補江總白猿傳》引文版本均據汪辟疆編《唐人小說》。此係汪氏以《顧氏文房小說》所據宋本為底本，參以《太平廣記》本，校錄而成，通行可靠。

對照史事，白猿的預言果然言中。歐陽紘的確有這樣一個受知於新朝「聖帝」唐高祖、光宗耀祖的兒子——歐陽詢。¹³ 歐陽詢不僅本人以書名世，其子歐陽通亦繼承家學衣鉢，書法乃一時之選，為高宗、武后朝人所重，有「大小歐陽體」之稱。歐陽詢的父祖均為六朝武將，於書法絕無家學淵源。至歐陽詢，忽一躍成為書壇宗匠之一，自必有原因。《補江總白猿傳》通過如此這般的影射，不外是想說，歐陽父子的書法天才，實得之於一頭白猿的生物性遺傳。

因為嵌有影射的因子，故事中處處皮里陽秋。《補江總白猿傳》通篇上下，歐陽詢的名字始終沒有正面被提及。即使在說到歐陽紘造反受誅、而其子得以倖免時，也用如下「姑隱其名」的曲筆：

後紘為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歐陽詢的名字雖然始終沒有被點明，但稍微細心的讀者，都會發現，上引的這段文字，像是從哪裏抄來的，因為它的遣詞造句，略加變幻，即一如《舊唐書》歐陽詢傳所載：

父紘，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僅而獲免。陳尚書令江總與紘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¹⁴

上述兩段文字都有歐陽「紘」以某種理由為某帝所「誅」，其子「聰悟絕倫（人）」，而由於江總「與」歐陽紘「有舊（善）」，遂「收（留）養之」，此子故「免」於難，長大後以「書」法名聞於「時」。細細玩味，就會發現，這段史書中的描寫與故事中的描寫相比較，字裏行間，似曾相識，句樣不二，¹⁵ 極像是從同一文本脫胎而來。這種章法的奧妙，在於利用小說與正史文字上的雷同，互文生義，讓會心的讀者能準確無誤地猜出，歐陽紘的那個「姑隱

13 歐陽詢與虞世南、褚遂良齊名，為隋末唐初三大家。其中，歐陽詢的書法最受唐高祖的器重和推崇，原因可以追溯到兩人在後者龍興之前的友誼。正史中就有歐陽詢在「高祖微時，引為賓客。及即位，累遷給事中」的記載，見《舊唐書》，卷189上 儒學傳上，頁4947。及至太宗的時代，歐陽詢的首席宮廷書法家地位則為虞世南所取代，其原因亦當與虞和太宗在東宮時的友誼有關。

14 見《舊唐書》，卷189上 儒學傳上，頁4947。另參《新唐書》，卷198 儒學傳上，頁5645。

15 關於古典中的句樣承襲問題，錢鐘書《管錐編》有精采論述。

其名」的兒子究竟是誰。

我懷疑，這一個可能被兩唐書和《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們共同參考過的文本，也許正是在歐陽詢死後，史臣所作的一篇蓋棺論定的「行狀」，或者是時人根據「行狀」所寫的傳記。¹⁶ 問題在於，正史中已明明白白地解釋清楚了歐陽詢之所以能從一個武將的後代而脫胎換骨、一躍成為唐初書法巨擘的兩大原因：除了天資外（聰悟絕倫），全得力於梁、陳間的文壇宗主之一江總的自幼悉心教誨（教以書計）。《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竟以偷梁換柱之法，用「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數語，把江總自幼開發歐陽詢書法天才的苦心和功績，一筆抹殺。同時，又將歐陽詢父子兩代書法名家的現象，歸之於白猿的遺傳，用心叵測。正因如此，我曾推測，《補江總白猿傳》很像一篇作於在武后朝中的文字。¹⁷ 如果事實確實這樣，那位「無名子」直接要打擊的對象，也許並不是歐陽詢本人，卻是他的兒子歐陽通，而事情最可能發生於歐陽通在天授二年（691）被來俊臣（651-697）誣死的前後。¹⁸ 無論如何，從這種互文生義的筆法（intertextuality），足以肯定，這一篇傳奇

16 《補江總白猿傳》如確作於初唐，絕無鈔成書於五代的《舊唐書》之理。而《舊唐書》作為正史，更沒有依據「滿紙荒唐言」的傳奇文寫列傳的體例，歷史學家章群對傳奇不入唐史的現象作過深入研究後認為，唐人筆記可供史家參考，而傳奇則萬不可作史料引用，因為前者尚記實，後者重虛構。此說見章群，《通鑑及新唐書引用筆記小說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頁1-5、27-29。

《舊唐書》成於五代，各部分所採史源十分複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外唐史學家曾致力於這個領域的探討，大都認為《舊唐書》初唐部分的列傳，主要取材於武后、玄宗時吳兢和韋述所撰唐史（均為當時之權威性史家）中的人物傳記，詳見崔瑞德（Denis Twitchett），*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以及謝保成《舊唐書》的史料來源，《唐研究》第1卷（1995），頁353-376。因此，我懷疑《補江總白猿傳》作者和《舊唐書》編者，也許在不同的時代，都不約而同地有機會直接或間接地接觸過歐陽詢的行狀（或看到過歐陽詢的行狀本身，或看到過吳兢、韋述輩根據行狀改寫的歐陽詢傳），又都從那裏原封不動地移植過若干文字（傳奇的作者要使讀過歐陽詢行狀或根據行狀改寫的傳記的人一眼就看出，這是在寫歐陽詢），不然便無從解釋為何這兩段文字如此相似。

17 參見拙作，《補江總白猿傳》文中所蘊道教色彩考，載黃子平編，《中國小說與宗教》（香港：中華書局，1998），頁47-70。

18 兩唐書均載歐陽通冤死事，大同小異，而以《新唐書》為稍詳。《新唐書》載：「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為太子，通與岑長倩等固執，忤諸武意。及長倩下獄，坐大逆死，來俊臣並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詞，俊臣代占，誅之。」事見《新唐書》，卷198 儒學傳上，頁5646；亦見《舊唐書》，卷189上 儒學傳上，頁4947-4948。

文在字裏行間，有所寄託。進一步解讀這段描寫的關鍵在於，此處的寄託涉及到歷史上的南朝名流、陳尚書令江總，¹⁹ 涉及到歐陽紇與江總的交情，以及江總在歐陽紇遇害後一肩承擔偌大干係，收養遺孤，保存亡友血脈的一系列真人真事。

瞭解了這個背景，《補江總白猿傳》篇名的涵意便水落石出了。這位匿名的作者是在暗示，作為歐陽詢的收養人，江總心裏明白這位日後大書法家的真正父親究竟是誰，並寫過一篇《白猿傳》暗示其事。但由於牽涉到他人隱私，江總不便直書其事，故而寫得語焉不詳、言猶未盡。於是，才用得著這位匿名的作者寫這一篇傳奇文來「補」江總《白猿傳》的不足，點明事實的真相，讓歐陽詢身世的秘密，大白於天下。²⁰

問題在於，古往今來的學人都認為，歷史上的江總從來沒有寫過什麼《白猿傳》，一切都是出於這位「無名子」混一真假的偽造，真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個「無名子」的這一篇謗文，不僅在罵歐陽詢，也在誣陷歐陽詢的父執、由陳入隋的名臣江總。²¹ 但是，它的構思匠心獨運，而筆墨又才氣橫溢，千古流傳，竟成為歷代文士公認的一篇謗書傑作。²² 也正因如此，它便又成為我們今天研究初唐傳奇文中的史實與虛構的

19 《陳書》江總傳 詳載江總在政壇文壇上的宗主地位，見唐 姚察、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點校本），卷27，頁343-347。

20 這篇傳奇文的篇名，宋人《新唐書》、《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均作《補江總白猿傳》，惟《太平廣記》載「出《續江氏傳》」。卞孝萱認為，《續江氏傳》即《補江總白猿傳》的縮稱，而《續江氏白猿傳》則為《補江總白猿傳》的異文。元、明間人提及這篇傳奇文，則多稱之為《白猿傳》，見《宋史》、《顧氏文房小說》及《合刻三志》等，可以理解為《補江總白猿傳》的縮寫。雖然《說郛》於該篇下有注云「託名江總」，表示元、明間人仍然知道這篇傳奇文含沙射影的來龍去脈，但畢竟已經事過境遷，沒有人再來計較「無名子」託名江總的種種動機了。

21 胡應麟一語道破：「此書本題《補江總白猿傳》，蓋偽撰者託總為名，不惟誣詢兼以誣總」，同註2。卞孝萱將《補江總白猿傳》納入初唐書法界的明爭暗鬥的複雜背景中，加以考察，實慧眼獨具，啟迪後學，同註7。

22 唐人傳奇中多謗書，已是為歷代批評界公認的不爭事實。程毅中分析近年在北大圖書館見到的一部單行本《唐人百家小說》時指出，該本把唐人小說分為偏錄家、瑣記家和託諷家三類，而沒有通行本的《五朝小說》中的傳奇家類。據程氏所記，《白猿傳》正為該單行本所收的56篇「託諷家」小說中的一篇。見程毅中，《唐代小說文獻研究》，《唐研究》，卷5（1999），頁45-57。由此亦可見，在明代選家和讀者的心目中，傳奇和託諷，往往是一件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一種絕妙教材。

二、幻設與影射 「年表錯亂」中的傳奇章法

本文研究的中心是《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如何用「年表錯亂」的章法，作含沙射影的攻擊。這篇傳奇文中所涉及的南朝梁、陳間若干史事，經過那位不知名的小說家運用所謂「幻設」手法，錯亂其年表、極盡顛倒騰挪之能事以後，它們在《補江總白猿傳》中早已變得非復舊觀，而化作小說文本製作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幻設」作為一個研究傳奇章法的術語，早見於明人胡應麟的筆下。我個人認為，其存在與否，是從文類上區別唐人的筆記和傳奇文的一個重要界標，²³而「幻設」筆法運用中涉及的層面之一，即是這裏要研究的「年表錯亂」。²⁴「幻設」的存在和運用，有時與影射交錯相關。在中國舊小說中，傳奇也罷，章回也罷，有影射處往往就有年表錯亂。²⁵初唐而中唐，此種章法在傳奇文中有極廣泛而精彩的運用，²⁶但惜乎迄今尚未引起海內外古典文學研究界的應有重視與探討，故有拈出加以研究的必要。

23 唐人的筆記與傳奇文，實為兩種性質不同的文字，亟宜分開。如何在理論上區分這兩者，仍是二十一世紀學界的一個有待完成的工作。直至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在中國和西方，對於究竟應該如何從文類上把唐人的傳奇文和唐人的筆記區別開來，仍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所幸者，近年對於唐人傳奇文具體篇目的文獻學研究，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例如關於唐代筆記小說的定義和分類，有周勛初的《唐人筆記小說考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關於唐人傳奇的最新編目，則有李劍國的《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等等。它們可以為今天的學者提供憑藉，進一步作出理論上的論證，而真正澄清唐人筆記與傳奇之間的區別，則是本世紀學術界面臨的一項富有挑戰性的任務。

24 《補江總白猿傳》中影射與年表錯亂的大綱，見拙作“Calculated Anachronism and Intertextual Echoes in *Bu Jiang Zong baiyuan zhuan*,” *Tang Studies* 14 (1996): 67-97. 本文乃是在該文基礎上，對史料領域內若干具體問題的深入一步的細緻考據研究。

25 關於影射在中國章回小說和西洋小說的比較研究中的地位，見拙作“The Poetics of Historical Referentiality: An Outline,” *Tamkang Review* 28.2 (Winter 1997): 1-64.

26 自從魯迅的《唐宋傳奇集》和汪辟疆的《唐人小說》出，盛唐乏傳奇，已為很多學者接受（當然也有持不同意見者，如近年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中即著錄若干盛唐傳奇文，但無一在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者）。但是，盛唐無傳奇的原因，似乎從來沒有人認真討論過。傳奇非盛世之文，不易出現在開元、天寶之世。其在初唐高宗、武后朝政局動盪、文化創新的時代產生，而在中唐大曆、元和之際的思想文化驟變期進入黃金時代，固其宜乎？

作為文學批評用語，我這裏所用的「年表錯亂」一詞，其源出自於張竹坡之評點《金瓶梅》。在《金瓶梅》讀法中，張氏曾鄭重其事地提出：

《史記》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時日也。²⁷

這裏，張竹坡儼然把小說與史書相提並論。張氏評的雖然是明清章回小說，但其創作的機樞與唐人傳奇文自有其一脈相承、波瀾不二的地方。無怪乎明、清間的批評家，有時說章回小說是「說部」，有時又說它是「傳奇」。在英文中，我把這類「年表錯亂」的文學現象稱之為 intentional anachronism，作為一種創作的手法來研究。

我曾提出，《補江總白猿傳》的篇首和篇末構成一個歷史的框架，而篇首和篇末之間，傳奇文的主體部分，則是一個虛構的白猿故事。關於這個故事本身，另作討論，這裏要研究的是一首一尾的歷史框架。其篇首僅 40 個字：

梁大同末，遣南平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紘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

經過中間嵌入的作為虛構核心的洋洋灑灑的長篇白猿故事，其篇末復云：

紘即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紘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也。後紘為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就地收煞。²⁸

從字面上看，似乎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補江總白猿傳》的核心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那故事一首一尾的框架，卻源自於歷史的真實。因為作者既明確告訴我們，故事發生在梁大同末，亦即西元 545 年或稍前，而這個時間框架裏又到處擠滿了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蘭欽、李師古、陳徹、歐陽紘、陳武帝乃至江總等等。一切似乎都鑿鑿有據，毫無問題。但若稍加以細考，就會發現事實絕非如此簡單，字裏行間處處混一真假，有「小說家言」的虛構玄機在焉。

27 清 張竹坡，《明代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臺北：廣文書局，1981年影印本），頁16。

28 前此雖有學者論及唐人傳奇中標注年號的現象，然而以「年表錯亂」為傳奇章法的研究，迄今尚未真正全面鋪開。較早觸及標注年號概念的學者有馬幼垣等人，見馬幼垣，《水滸論衡》（臺北：聯經，1992），頁191。我所提出的篇首篇末歷史框架問題，見拙作《補江總白猿傳》文中所蘊道教色彩考，參註17。

二十世紀上半葉研究傳奇文的諸位先進，目光如炬，他們早已經看出，上述框架中存有若干明顯的史實性的錯誤。首先，梁代史無蘭欽其人，這裏所謂蘭欽也者，疑為梁代名將蘭欽之誤，「蘭」與「蘭」寫法極似，讀法差別僅一音之轉耳。其次，梁代史無陳徹其人，疑為梁代廣州俚帥陳文徹之誤。再次，歐陽紘並非為陳武市（557-559 在位）所誅，誅歐陽紘者為陳宣帝（569-582 在位）。²⁹ 這麼多錯誤，全發生在上引故事篇首的短短 40 字中，密集的程度，令人驚訝。

但是，長期以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學術界並未能在此基礎上，對這個問題作更深層次的探討，以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弄清楚這類錯誤在《補江總白猿傳》中到底有多少分量？初唐之世，去梁未遠，究竟基於何種原因，在這位自隱其名的作者的筆下竟會出現如此之多的明顯的常識性史實錯誤，造成年表的錯亂？面對這些令人困惑的問題，大家似乎都滿足於如下的這樣一個未經深究的假定：《補江總白猿傳》中所有的史實錯誤似乎僅止於上列諸處，而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很可能只是出於作者偶然的筆誤，或者甚至於只是鈔胥之誤，因此並無足深論。

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日人內山知也的《補江總白猿傳》考 長文問世，人們才意識到在《補江總白猿傳》篇首的短短 40 字中原來竟還有更多、更複雜的錯誤。內山氏在這方面的貢獻甚多。首先，他考出了蘭欽之南征平蠻，不在梁大同末；而歐陽紘也並未參加蘭欽的南征，參加者乃是其父歐陽顥（498-563）。其次，他又考出在梁代史無李師古其人，李師古乃是中唐的蕃將，內山懷疑這裏滲入隋代開皇年間桂州俚人李光仕或李世賢的事跡。但是，連內山也簡單地認為，這些錯誤，或者說年表的錯亂，是由於《補江總白猿傳》一文作者的歷史知識薄弱所造成，而未從深一步去研究。³⁰

本文即以內山氏三十多年前的考證為出發點，繼續探討《補江總白猿傳》中的史實與虛構。

29 正史載：「太建元年〔569，陳宣帝年號〕，下詔徵紘為左衛將軍。紘懼 伏誅。」事見《陳書》，卷 9 歐陽顥傳，頁 159-160。

30 詳見內山知也，《補江總白猿傳》考，《內也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學論集》（東京：漢魏文化研究會，1964），頁 235-260。同一理論，亦見於內山後來研究隋唐小說的專書中。

三、小說中的蘭欽南征平蠻考 時間上的、地點上的和對象上的「年表錯亂」

《補江總白猿傳》故事框架的基本歷史支點之一，是所謂「蘭欽南征」。如果這個「蘭欽」確是歷史人物蘭欽的誤書，則其人其事，尚斑斑可考。此公為梁代武帝朝名將，勇冠當時，《梁書》、《南史》均有傳，唯其生卒年月不詳。我們稍一爬梳史料，發現就歷史上的蘭欽的生平而言，正史其實已經提供了一份大致上靠得住的粗線條年表：³¹

499-502	齊末（479宋末？）	蘭欽隨父子雲於洛陽市中騎囊駝 ³²
502-519	梁天監年間	蘭子雲還南仕梁，蘭欽隨之
527	梁大通元年	蘭欽首次北伐攻魏，時銜為東宮直閣
527-534	梁大通至中大通？	蘭欽首次南征討桂陽、陽山和始興叛蠻
535	梁大同元年	蘭欽第二次北伐成功，授衡州刺史
536	梁大同二年？	蘭欽第二次南征，於廣州擒俚帥陳文徹
537	梁大同三年	蘭欽昇平南將軍，封曲江縣公
538-541	梁大同四至七年	蘭欽衡州有惠政，入京遷左衛將軍 ³³
541	梁大同七年	廣州刺史蕭映卒
542	梁大同八年？	蘭欽受命接任蕭映，至嶺遇害 ³⁴

31 歷史上的蘭欽的那份復了原的真實年表，讀來雖然像一篇陳年流水帳，其中卻蘊有若干重要的人、事、時、地信息，是我們繼續研究《補江總白猿傳》中的史實與虛構的關鍵。凡涉及此類信息的地方，我在本節裏和以下各節中均用黑體標出，作為貫通前後的整合研究的出發點。凡年表中用問號的地方，表示史無明文確定，年代係我根據前後事件所作的推測。

32 《南史》蘭欽傳 稱蘭欽為「魏人」，說他於「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恆於市騎囊駝」，見唐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 1975 年點校本），卷 61，頁 1504（蘭欽為魏人，洛陽為北地，這裏之所以用南朝年號，似為《南史》紀年之便耳。《梁書》蘭欽傳 則未提及此事）。按劉宋亡於順帝昇明三年（479），蘭欽於宋未能在洛陽市中騎囊駝，其時即使尚在童年，至少也有四、五歲。據此則蘭欽似應生於劉宋後廢帝元徽（473-476）年間。但徵之於其他記載，此說極可疑，故疑「宋末」為「齊末」之誤。

33 歷史上，蘭欽到任衡州後，「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見《梁書》，卷 32 蘭欽傳，頁 467；《南史》，卷 61 蘭欽傳，頁 1504。

34 據《梁書》蘭欽傳，蘭欽奉旨南下刺廣州時中毒遇害，卒年四十二，見《梁書》，卷 32，

從這個歷史的年表出發，我們便能夠入手比較歷史人物蘭欽和《補江總白猿傳》中的虛構人物蘭欽其人其事的異同，重點則放在「南征平蠻」上，作對照研究。

我認為，《補江總白猿傳》向壁虛構藝術的不二法門，便是所謂「時間上的年表錯亂」(anachronism temporal)、「地點上的年表錯亂」(anachronism spatial)和「對象上的年表錯亂」(anachronism nominal)的綜合運用。而傳奇章法的一大要訣，正是運用這種時間、地點和主體的「文際互證」來構築文本，使之成為一個擁有融會史實與虛構多層面深度的中介。³⁵

「時間上的年表錯亂」，顧名思義，易於理解。我們知道，歷史上蘭欽的仕履，都展開在梁武帝北拓疆域、南平蠻俚的大背景中。其南征年代之模糊，³⁶正好被《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利用來作「年表錯亂」的處理，而其中的關鍵在於「大同初」與「大同末」年號的對換。

歷史上蘭欽南征的具體時間，雖史無明文，一切線索卻全指明，蘭欽兩次南征應該都發生在（或接近於）「大同初」，而非「大同末」。³⁷如前所述，

頁 467。我認為，此處《梁書》關於蘭欽卒年記載，與前註引《南史》關於蘭欽生年的記載，有內在矛盾。註 32 引《南史》稱，蘭欽宋末於洛陽市中「騎囊駝」。宋亡時假定蘭欽年僅五歲，則其應生於劉宋後廢帝元徽二年（474）。依此推算，四十二歲卒時，應為梁天監十五年（516），而其時上表所列的四次重要南征北戰，連一次也尚未發生。這顯然於事理不合。因此，《南史》之稱蘭欽生於宋亡之前，與《梁書》之載蘭欽卒年為四十二歲，兩者至少必有一誤。我懷疑，《南史》所載的「宋末」或許是「齊末」之誤，如此則五世紀末、六世紀初蘭欽隨父在洛陽「恒於市騎囊駝」，而於四十二歲前後卒於梁大同末，才與理相去未遠。

35 詳拙作，同註 24。

36 蘭欽成年後仕梁，南征北戰，屢建奇勳。其中有二次南征，與本文所討論的「平蠻」有關。而在這二次南征之間，又夾有二次攻魏的北伐。有趣的是，蘭欽北伐的年月，均有記載，而其南征的時間都史無明文。《梁書》和《南史》，均修於初唐。根據唐人史筆的慣例，至少在當時人眼中，蘭欽南征的意義，似乎不如他的北伐重要，所以才不書年月。我們的討論，就圍繞這四次戰役逐步展開，而其北伐年代正可有助於定位其南征的年代。詳見上表中的黑體。

37 蘭欽的第一次北伐是梁大通元年（527）五月之攻魏，破蕭城、彭城，斬魏將曹龍牙，大獲全勝。此時蘭欽之銜為東宮直閤，而非《補江總白猿傳》中的「平南將軍」。這次北伐後，蘭欽開始了第一次南征。南征的具體時間雖無可確考，但據《梁書》行文次序可知其必在蘭欽第一次北伐之後，第二次北伐之前。下面正中引文中所提到的元慶和其人其事，是一個關鍵的參照點。內山知也曾根據以上引文中「會衡州刺史元慶和為桂陽人嚴容所圍」一句，查得元慶和原仕北朝，於大通元年（527）降梁，是年蘭欽正在首次北伐中。而時隔七年之後，元慶和又於中大通六年（534）受梁之命統兵伐魏。內山據此推定其在南朝任職衡州刺

歷史上的蘭欽平定活躍於湘南粵北的長樂洞蠻，是在其首次南征時，應當發生在中大通末或大同初。而其第二次南征是平俚之役，約發生在大同初，所平者為粵南之「俚」、「獠」，而並非湘南之蠻，方會有廣州擒「俚帥陳文徹」之說。反過來說，根據正史中的年表，蘭欽的兩次南征，都無法發生在「梁大同末」，因為到了梁大同末（545），蘭欽如非已死去，則在赴任廣州途中，不可能分身南征平蠻。³⁸ 以上種種，足證《補江總白猿傳》所謂「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云云，全是錯亂年表的小說家言。而《補江總白猿傳》的這個似是而非的「歷史」框架，更是作者基於年表的錯亂而故弄的玄虛。

說到「地點上的年表錯亂」和「對象上的年表錯亂」，《補江總白猿傳》

史、被圍羅溪之事，宜在大通元年與中大通六年之間（亦即西元 527 年之後，534 年之前），因此蘭欽之第一次南征、解元氏圍於羅溪，亦必在此時間範圍之內。參照內山的研究，我則在查《南史》梁武帝諸子傳時，檢得一旁證：邵陵王蕭綸於中大通四年（532）或稍後曾參與梁武帝餞元慶和刺衡事（邵陵王蕭綸，武帝第六子，不僅是梁代宮廷的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而且還有過人的文采風流。包括蕭綸在內的梁代宮廷這張關係網中，不乏這類人才一時之選的文采風流之士。如下文提到的韋粲，即為另一例）。元慶和棄魏降梁，乃是因為梁將夏侯夔所收服，而夏侯夔又是邵陵王舊部。這回梁武帝餞元慶和，邵陵王蕭綸之所以應詔作陪，很可能與這段淵源有關。這從側面證實了中大通六年伐魏之前，元氏的確曾任衡州刺史，與上引《梁書》蘭欽傳所述羅溪被圍事並無不合。據常理看，降將宜先留京考察一段時間，然後才能委以地方上的重任，元慶和在梁的待遇，似不例外。從元氏中大通四年在建康受梁武帝御宴餞別一事推測，很可能其受任刺衡，奉旨出京，正在中大通四年，距其降梁有數年之久。而元氏被圍羅溪，極可能發生在是年之後。當時蘭欽的地位似乎也只是以東宮直閣的頭銜，持節都督三郡的部隊，實權雖不小，但只是暫時的指揮權。因為他在平三郡叛蠻勝利後，才獲封食邑區區五百戶的安懷縣男，可見其時頭上絕沒有《補江總白猿傳》中所謂「平南將軍」之類的顯赫尊號。據此，歷史上，蘭欽首次南征的時間，極可能發生在中大通六年和大同元年之間，甚至可能從中大通六年開始，延續到大同元年結束，亦即西元 534 年至 535 年。因為中大通六年之後，元慶和統兵伐魏，不在衡州，無從被圍。同時，蘭欽在大同元年，已開始第二次北伐，不可能南下救人。此役之後，蘭欽南返就職衡州刺史，經廣州，「破俚帥陳文徹兄弟」，是為其第二次南征，實乃在就職途中的順便之舉。時間亦應在大同二年前後。然後，蘭欽至衡州，才進號平南將軍，改封為曲江縣公。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蘭欽在第一次南征成功之後，獲封男爵，而在第二次南征後，獲封公爵，短短時間中越過侯、伯、子三階。作為戰將，蘭欽之發跡成名，其在此二次南征之間乎？但儘管如此，作為一個歷史人物，蘭欽的戰功主要在於北伐。在人們的心目中，他的南征的年月始終是模糊的，或者說是次要的。

38 參上註。

寓真於假的一個關鍵，正在於南征的地點「長樂」和對象「洞蠻」，在正史和小說中既遙相對應，又錯落不同。經作者渾一真假，略加點染與變化，便演史實為小說。

請先看《梁書》蘭欽傳 中對於蘭欽首次南征的記載：

又假欽節，都督衡州三郡兵，討桂陽、陽山、始興叛蠻，至即平破之。會衡州刺史元慶和為桂陽人嚴容所圍，遣使告急，欽往應援，破容羅溪，於是長樂諸洞一時平蕩。³⁹

而《補江總白猿傳》則如此敘述一個對應的虛構故事：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

首先又是句樣的相似。對照上面正史和《補江總白猿傳》中的兩段文字，讀來有似曾相識之感，疑《補江總白猿傳》中虛構的蘭欽所謂「南征，至桂林」，其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云云，實脫胎於正史記載中的「又假欽節，討桂陽、陽山、始興叛蠻，至即平破之。於是長樂諸洞一時平蕩」之語。⁴⁰《梁書》修於初唐之際，有理由懷疑，《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不僅有機會讀過《梁書》本傳所本的「蘭欽行狀」，甚至有機會讀過《梁書》本身。

妙的是，歷史上蘭欽的第一次南征平蠻，在湖廣交界的地方；並未到過小說中的廣西桂林。具體地說，歷史上的蘭欽平蠻的地方，是在湘南粵北邊界的一塊三角地帶，位於桂陽、陽山、始興的中間。這一地區叛蠻的大本營則是山險洞多的去處長樂。長樂洞蠻，聞名於六朝和隋唐之際的南部中國。首先，《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抓住「長樂」這個讀者談虎色變、耳熟能詳的地名，取其同；再把「桂陽」換置成「桂林」，又同中取異。虛中有實，實中有虛，便構成這裏所研究的「地點上的年表錯亂」。

39 見《梁書》，卷 32 蘭欽傳，頁 466。《南史》蘭欽傳 對此事的記述較略，僅「欽兼文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者，所至皆平」數語，見卷 61，頁 1504。這裏，我們不難注意到，《梁書》（《梁書》關於此事件的記載，遠較《南史》的為詳）對這段歷史的描寫，與《補江總白猿傳》中虛構的平南將軍蘭欽南征，從主體到地點再到對象，都十分類似，但傳奇文經過了「年表錯亂」的藝術處理。

40 《補江總白猿傳》如果的確作於高宗、武后朝，則其作者便有可能參考《梁書》，因為其時《梁書》早已成書，並有一定範圍的流通。

除了「地點上的年表錯亂」，《補江總白猿傳》中更多「對象上的年表錯亂」。故事的主體，在正史中是歷史人物蘭欽，在小說中則是對應的虛構人物蘭欽。對應的技法，一方面在於利用姓「蘭」姓「蘭」的一音之轉把兩人聯繫在一起，另一方面則依靠「平南將軍」的共同頭銜，把他們整合在一起。從上節所述，我們知道，歷史上的蘭欽在第二次南征成功後，曾被封以「平南將軍」的頭銜。顯而易見，此即小說中所謂「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一語在歷史上的根據。然而，那位匿名的作者，先通過時間上的「年表錯亂」法的處理，把歷史人物蘭欽在其二次南征後才得到的「平南將軍」頭銜，變成對應的虛構人物蘭欽在南征之前已獲得的頭銜，以造成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效果。這樣，把歷史人物不同時期的頭銜，張冠李戴地套在虛構人物的頭上，又是對象上的「年表錯亂」的一個手法。⁴¹

如果承認《補江總白猿傳》中的「陳徹」是歷史上「陳文徹」的誤書，另一個「對象上的年表錯亂」的顯例是《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混淆「蠻」、「俚」之辨，虛實相錯。在唐初，「蠻」和「俚」均為南方的主要少數民族，但在一般人的心中，是有明顯的區別的，首先是他們活動的區域不同。綜上所述，歷史上的蘭欽在梁大同初前後的第一次南征所平者是湘南粵北桂陽、陽山和始興三角地帶的長樂洞蠻，而緊接著的第二次南征卻是平定粵南的廣州俚帥陳文徹。《補江總白猿傳》中「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的敘述，把陳文徹的俚帥身分明換成了蠻將，同時又把擒陳文徹的地點從廣州暗換成長樂。這樣一來，便把事物發生的時間和地點都錯亂了。可以說，這是一個同時運用「時間上的年表錯亂」、「地點上的年表錯亂」和「對象上的年表錯亂」的複合的例子。⁴²

總結上文分析可知，乍一看去，《補江總白猿傳》所述似為歷史上蘭欽的南征，僅僅把「蘭」欽錯寫成了「蘭」欽。進一步探究，我們發現，《補

41 面對這段錯綜複雜的歷史，《補江總白猿傳》作者極可能故弄玄虛，利用蘭欽南征年月史無明文的漏洞，根據史實，加以剪裁，錯亂其年表，把大同初換成大同末，又顛倒變換其頭銜，把小官「東官直閤」變成大官「平南將軍」，演義成一篇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的傳奇文。

42 參見拙作，同註24。

《補江總白猿傳》作者筆下的蘭欽南征，其實時、地和對象皆誤。《補江總白猿傳》選大同末（545）作為半虛半實人物「蘭欽」平蠻的年代，也許並非出於偶然，因為稍具南北朝歷史常識者均知，中大同元年（546），是梁代疆域拓展的全盛時期。《補江總白猿傳》出於唐人之手，去梁未遠，南北朝諸正史又十九修於唐代，這類易「大同初」為「大同末」的錯誤，幾乎不可能是出於粗心疏忽。恰恰相反，作者極似深諳梁代北拓境宇、南平蠻俚的時代大背景，而有意使用後人所謂的「七虛三實」之筆墨，來精心營造一個處處對應現實的虛構影像，以小說中之「蘭欽」對應歷史上之「蘭欽」；復以小說中蘭欽之「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對應歷史上蘭欽首次南征時之「長樂諸洞一時平蕩」；更以小說中蘭欽之「破李師古、陳徹」對應歷史上蘭欽再次南征時之「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最後又以小說之「梁大同末」對應歷史上蘭欽首次南征之中大通末和再次南征之大同初。於是，《補江總白猿傳》中歷史框架的結構，令熟悉歷史的人們讀來，感到在虛虛實實中，有法度井然的章法。

四、陳文徹考 「年表錯亂」與臺城保衛戰投射 在《補江總白猿傳》中的歷史影子

綜上所述，我們已知道，《補江總白猿傳》開場白中所謂的「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云云，實在是錯亂歷史真相的一派胡言，因為蘭欽的南征既不在梁大同末，而他擒陳文徹是在廣州，也不在桂林。本節重點探討陳文徹其人其事，通過這個人物來發現《補江總白猿傳》中年表錯亂的更深層奧秘。

歷史上的陳文徹，原是廣州西江一帶俚人軍事首領，早年曾經多次反叛朝廷，但先後被廣州刺史蕭勵和即將就任衡州刺史的蘭欽降服。⁴³ 從現存史料，對蕭勵擒陳文徹與蘭欽擒陳文徹的具體時間，史無明文，無法斷定，因

43 梁室宗親蕭勵任廣州刺史時，頗有政績，而其政績之一，即為擒陳文徹。據《南史》蕭勵傳載：「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而西江俚帥陳文徹出寇高要，又詔勵重申蕃任。未幾，文徹降附。」見《南史》，卷 51，頁 1262-1263。

此也無從知道孰先孰後。⁴⁴不過，陳文徵的身分既為定位為「西江俚帥」，應是出沒於廣州附近的粵南水寇，而決非湘南的洞蠻。廣州之重要，在梁代決不下於湘衡二州。東晉南渡後，經過多年的開發，到梁代，嶺南已崛起成為當時舉足輕重的重要經濟區，有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⁴⁵梁代廣州刺史之職，為一比衡州刺史更大的肥缺，多由皇室宗親擔任，先後有蕭勵、蕭映和蕭勃等。⁴⁶偶用外姓，也是作為一種寵遇，包括元景仲和蘭欽等。⁴⁷前任衡州刺史蘭欽之所以中毒遇害，是因為在廣州刺史蕭映死後臨時代理此職的梁室宗親蕭恬不願向蘭欽交出這個職位，這個肥缺之引人，可見一斑。⁴⁸

就地點而言，從現存文獻來看，沒有任何理由認為陳文徵與桂林有任何關涉，因而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不按照歷史的真實，老老實實地讓蘭欽在廣州擒陳文徵，卻非要讓蘭欽在桂林擒陳徵。這裏到底弄的是什麼玄虛？

桂林，梁時屬桂州。據《梁書》載，大同六年（540）十二月：

-
- 44 《廣東通志》估計蕭勵擒陳文徵的時間約在中大通和大同年間，見清 阮元監修、今人李默點校，《廣東通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頁 39。至於蘭欽擒陳文徵，《梁書》蘭欽傳、《南史》蘭欽傳 不約而同、大同小異地記載：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徵兄弟，並擒之。見《梁書》，卷 32，頁 467；《南史》，卷 61，頁 1504。文字唯一不同處為《梁書》用「並擒之」，而《南史》用「並禽之」，具體年月，卻無可確考。我認為，此事可能發生在大同二年（536）前後，詳見註 37。
- 45 不少史學家認為，六朝的嶺南開發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孫吳時期，第二次是東晉時期，第三次是蕭梁時期。
- 46 蕭勵為蕭勃之兄，江總元舅。他名重當世，文采風流，「聚書至三萬卷，披翫不倦，尤好《東觀漢記》」。見《南史》，卷 51 蕭勵傳，頁 1263。至於他與江總的關係，正史記載：江總「舅吳平光侯蕭勵，名重當時，特所鐘愛，嘗謂總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見《陳書》，卷 27 江總傳，頁 343。蕭勃為江總九舅。史稱，侯景之亂平，蕭勃據廣州，「總又自會稽往依焉」，見《陳書》，卷 27 江總傳，頁 345。他也是梁、陳易代之際，宮廷關係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與歐陽頎和陳霸先的關係，詳見下節。
- 47 《梁書》武帝本紀下 載，普通六年（525），元景仲為廣州刺史，見《梁書》，卷 3 武帝本紀下，頁 69。而《南史》又載，大同八年（542），蕭映已任廣州刺史，見《南史》，卷 9 陳本紀上，頁 258。據此，《廣東通志》推測蕭勵任廣州刺史的時間當在元景仲之後、蕭映之前。
- 48 史稱蘭欽：「後為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及聞欽至嶺，厚貨廚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見《南史》，卷 61 蘭欽傳，頁 1504-1505。其實，蘭欽之遇害，是梁代宮廷中的皇族與外姓爭奪廣州刺史一職，矛盾激化的後果，為梁代宮廷關係網中複雜鬥爭的一種表現。

置桂州於湘州始安郡，受湘州督；省南桂林等二十四郡，悉改屬桂州。⁴⁹

桂州從湘州分出，與衡州比鄰，其行政地位不如衡州重要，衡州地方和軍事長官常兼領桂州事。梁、陳間交、廣、衡、桂四州並列，出於地域間的緊密聯繫，並非偶然。我們歷史上的主人公蘭欽，在第二次北伐成功後，即進號智武將軍，授衡州刺史，都督衡桂二州軍事，可為一例。而蘭欽在其第一次南征時，曾「都督衡州三郡兵，討桂陽、陽山、始興叛蠻」，亦離桂州不太遠，宜乎傳奇文中竟變幻出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之說。更有甚者，在歷史上，明明蘭欽直接在桂陽羅溪破嚴容，蕩平長樂諸洞蠻，《補江總白猿傳》非要節外生枝，說是蘭欽先到桂林，然後其別將歐陽紇才「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這種張冠李戴的演義手法，正好暗示出長樂諸洞在桂州附近，離歷史上蘭欽征蠻的桂陽、陽山、始興三角地帶不遠。

簡言之，我們如果把《補江總白猿傳》放到梁、陳易代之際的歷史背景中看（這種情形某種意義上甚至延續到陳末隋初），不難發現，其時南方交、廣、衡、桂四州少數民族叛亂時起，內中叛蠻以衡州為中心，而叛俚以廣州為中心，所以梁、陳的衡州刺史和廣州刺史多以皇室宗親或外姓重臣任之。湘衡邊界，尤其桂陽、陽山和始興這一帶，是梁、陳間叛蠻輩出的地方，而在這一帶平亂成功的官軍將領，都贏得威望，斐聲南土。尤其是始興，為這一多事三角地區的軍事重心和戰略要地，平蠻也罷，平亂也罷，奪取對始興的控制權，是勝利的一大關鍵。因此，不僅蘭欽在此平過洞蠻，其部將歐陽顥也在此獨立平過洞蠻，不僅歐陽顥平定過洞蠻，其子歐陽紇也曾在此平叛，「克定始興」，而他們三位都因此而有聲於南方。⁵⁰ 長樂諸洞為當時洞蠻大本營。《補江總白猿傳》雖然虛構了一個故事的地點桂林，卻仍把歷史的地理背景放在這個區域內，藉以連接蘭欽、歐陽顥和歐陽紇的事跡為一體，從錯亂了的具體地點中輻射出歷史的大真實來。

與此有關，據傳奇文的作者說，蘭欽在桂林破李師古和陳徹。我們既知陳徹如大多數學者所認為什九乃是陳文徹的省略。那麼，那個李師古又是何方神聖呢？我們知道，梁、陳之際，史無李師古其人。大多數學者認為，《補江總白猿傳》中的那個李師古完全無考。唯根據內山知也的看法，

49 見《梁書》，卷3 武帝本紀下，頁85。

50 上舉僅數例。此外，陳霸先曾在始興破蘭裕，蕭勃亦曾據始興以為屏障，足證其重要。

此人可能和隋代桂州俚帥李光仕有一定關係。因為李光仕反叛的根據地，是在桂州始安郡，正是《補江總白猿傳》中桂林的所在地。而梁、陳、隋、唐間湘、桂、衡地區少數民族造反首領為李姓者，屈指可數，其中著名者似只有李光仕。此說雖證據欠足，然可備一解。⁵¹查《隋書》，其事略如下：

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眾為亂，詔稱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上大悅曰：「何稱著信蠻夷，乃至於此。」⁵²

可以看到，何稱討嶺南事也算是當時傳頌一時的佳話，《資治通鑑》繫之於開皇十七年（597），而地點正在湘、衡、桂州之間，⁵³所以內山氏推測李光仕造反的種種史實經過「年表錯亂」被揉入小說，也許不無道理，它為《補江總白猿傳》中言之鑿鑿的地點「桂林」提供了一條聯想上的旁證。

另外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是，陳文徹在歷史上與梁代宮廷中蘭欽等人的深層關係。欲廓清這一點，我們仍須從陳文徹被蘭欽和蕭勵降服之後的命運談起。陳文徹兩次被「擒」或「降附」後結果如何，是放歸故里，還是招安封以官爵？他為什麼降而又反？以上歷史文獻中都沒有說。我個人認為，蕭勵之擒陳文徹與蘭欽之擒陳文徹，無論孰先孰後都必定發生在太清二年（548）的侯景之亂以前，而至少陳文徹在最後一次降梁後，是被封以官爵的。

我之所以這樣假定，是因為在有關侯景之亂的臺城保衛戰的歷史文獻中，陳文徹的名字是記錄在案的。在侯景之亂的高潮中，關鍵的一役是雙方喋血梁京建康的臺城之戰，而陳文徹作為一個方面軍的將領曾出現在這次浴血勤王的保衛戰中。其時，陳文徹早已不是一個叛蠻的首領，而已官拜南陵太守。臺城保衛戰的最初盟主不是別人，乃是大名鼎鼎的武帝第六子、邵陵王蕭綸。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抽絲剝繭，尋繹出一張梁代宮廷中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網絡，而弄清這張潛在的網絡，會有助於我們理解與《補江總白猿傳》有密切關係的若干歷史人物的背景，詳見下節。這裏先要點出的是，在臺城大戰中趕來增援蕭綸的勤王聯軍中的重要首領之一，乃是當朝重臣、衡州刺史章粲，⁵⁴其人與蘭欽和歐陽頎都有一定關係，而臺城保衛戰中的陳

51 同註30。

52 唐 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點校本），卷68 何稱傳，頁1596-1597。

53 宋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點校本），卷178，頁5552。

54 章粲事詳後。

文徹所部又正是以韋粲為中心的增援勤王聯軍的一部分。由此可見，陳文徹其人，不僅曾是邊地廣州的一個經常和政府搗亂的少數民族軍事首領，而且還在受招安後官拜南陵太守，成為當朝主流社會中一個地位不低的地方官員，在當時不失為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為眾所知。他並且因為參加了勤王之役建康保衛戰，而名垂史冊。需知初唐去梁未遠，人們談起侯景之亂，不寒而慄，記憶猶新，《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要把陳文徹寫進傳奇文中去，並錯亂歷史的年表，就不得不加以一番包裝，使之不容易被人抓住把柄。我懷疑，這就是為什麼《補江總白猿傳》中的「陳徹」比歷史上的陳文徹省略了一個「文」字的原因。

綜上所考，可見「年表錯亂」的運用，是一大趣味盎然、煞廢苦心的創造性虛構。時間、地點和對象，在《補江總白猿傳》的「年表錯亂」之中，無疑都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把事實與虛構、歷史與小說聯絡在了一起。每個地點和對象，都於當時的南征平蠻俚的背景有關。小而言之，桂林為一例。大而言之，可舉衡州和廣州為例。不僅蘭欽曾先後任衡州和廣州刺史，梁代宮廷關係網中的許多其他人，也都先後曾任衡州刺史或廣州刺史（曾任衡州刺史的包括韋粲、歐陽頤和歐陽紇，曾任廣州刺史的包括蕭勳、蕭映、蕭勃、歐陽頤和歐陽紇），或多或少地捲入過平定蠻、俚的武功。中間而言之，衡桂邊界的始興，和本文中提及的幾乎所有重要人物都有關係，而以與歐陽頤、歐陽紇父子的關係為最切題。

五、歐陽頤、歐陽紇父子平蠻考 侯景之亂 與梁、陳之際的宮廷關係網

既然《補江總白猿傳》的中心是影射歐陽詢，詳細對照有關歐陽一家的歷史紀錄，才能真正明白事實與虛構的界線。本節之中，我們便要進一步從分析歷史上的歐陽頤和其子歐陽紇其人其事入手，考訂梁、陳之交的宮廷人際關係網，深入研究它與《補江總白猿傳》的聯繫。

歷史事實是，歐陽頤曾隨蘭欽南征平俚，歐陽紇曾隨歐陽頤平蠻。換言之，歐陽紇「余生也晚」，從未追隨蘭欽平蠻或平俚。《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偏偏要錯亂其年表，說成「平南將軍蘭欽南征」、「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

樂」。這位匿名的作者既大言不慚地要發掘隱微，以「補」江總所撰的《白猿傳》之不足，難道他真的會連誰是父親誰是兒子都搞不清楚嗎？

我個人認為，《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之所以摒歐陽頎這位歷史上的中心人物於故事之外，也許是有意之舉，運用的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傳奇筆法。因為，歐陽頎雖然在《補江總白猿傳》中未被提及，卻是唯一的一位與所有被提及的歷史人物——蘭欽、陳文徹和歐陽紘——都有直接關係的人物。歐陽頎上接蘭欽，下連歐陽紘，從其人其事，最能看出梁、陳之間南方位局的風雲變幻和宮廷關係網中的恩恩怨怨。

史載歐陽頎為長沙臨湘人，歐陽紘之父，歐陽詢之祖。其家世代「為郡豪族」。頎祖景達，父僧寶，生平事跡均無可詳考。歐陽頎在步入宦途之初，曾在邵陵王蕭綸府中任中兵參軍事，是其權力集團的外圍人士。⁵⁵而歐陽頎此後的仕宦生涯，則先後與蘭欽、陳文徹、韋粲、蕭映、蕭勃都頗有交涉，最後又成為後來的陳武帝陳霸先的心腹將領，實在是梁、陳易代之際，宮廷權力網中的一位左右逢源人物。

先看歐陽頎與蘭欽、陳文徹的關係。《陳書》歐陽頎傳稱：

梁左衛將軍蘭欽之少也，與頎相善，故頎常隨欽征討。欽為衡州，仍除清遠太守。欽南征夷獠，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類代所無，頎預其功。⁵⁶

從以上引文可知，歐陽頎與蘭欽少時即有交情，在仕途中，蘭欽始終不倦地提携歐陽頎。而歐陽頎又確曾在蘭欽的第二次南征中扮演過一個重要的角色，於廣州協助歐陽頎平陳文徹有功。據上文所考，這裏《陳書》歐陽頎傳中所記載的這次南征，無疑是指《梁書》蘭欽傳中的蘭欽第二次南征，時間當在大同二年（536）前後，也就是倒影在《補江總白猿傳》中的那次經過了年表錯亂的南征。在歷史上，此次南征，原只是蘭欽赴任途中順便之舉。但《陳書》在此提供了一項重要信息，為《梁書》蘭欽傳所不載：此次平倥中，在歐陽頎的協助下，蘭欽繳獲了大量的戰利品，其中包括一面極其罕見的大銅鼓。這面大銅鼓的罕見希奇，一定曾在當時的朝野引起過一番轟動，所以才記錄在後來所修的正史中。正是這面大銅鼓，引出了兩位在梁代宮廷關係網中的重要人物，右衛朱異和左衛韋粲。

55 《陳書》，卷9 歐陽頎傳，頁157。

56 同上註。又《南史》，卷66 歐陽頎傳，頁1613-1614，所載略同。

這面銅鼓的去向，《陳書》中沒有詳細記載，只用了一個「獻」字，可見蘭欽沒有保留這面稀世的銅鼓，而把它獻給了某人。從可靠的歷史資料看，這個某人並不是當朝至尊梁武帝，卻是朝中的重臣朱異和韋粲。據《南史》羊侃傳 所載，在一次羊侃與蘭欽共同出席的宮宴中，羊侃突然當場發難，居然在當事人和武帝面前，把蘭欽送銅鼓給朱異和韋粲、交接權貴的事情抖了出來：

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異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宜適。」朱時在坐。⁵⁷

羊侃在此直斥蘭欽用稀有的戰利品大銅鼓賄賂朝中有影響力的大臣，而朱異當時又在場，⁵⁸ 想來決非完全空穴來風，而是一件盡人皆知、閉口不言的新聞。同時可以看得出，在梁代宮廷的關係網中，朱異、韋粲、蘭欽、乃至於歐陽顥，都是一條線上的人物，相互提攜。大同四年至七年，蘭欽之從衡州刺史任上調任京官，拜左衛將軍，除了官冕堂皇的「吏民詣闕」為蘭欽請獎的理由外，是否與這面大銅鼓有一定的關係，很令人懷疑。蘭欽任職左衛以前，朱異為右衛，韋粲為左衛，二人有合作，又有矛盾。⁵⁹ 蘭欽曾送大銅鼓給二人，後來升任京官時，是否同時得到二人或其中一人的推薦支持？從羊侃的一個「買」字裏看去，令人生疑。⁶⁰ 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蘭欽的這面大銅鼓，得之於陳文徹，而歐陽顥預其功焉。

再看歐陽顥與韋粲的關係。蘭欽南征平俚後，歐陽顥有所擢升。蘭欽死後，他獨當一面，並曾在韋粲的領導下，主持平定過湘衡邊界一帶的洞蠻，爾後又經韋粲保舉代理衡州的長官。這是否也與上述那面大銅鼓有關，史無

57 《南史》，卷 63 羊侃傳，頁 1544-1545。

58 朱異在朝中影響力之大，可從正史的江子一傳中看出：「其姑夫右衛將軍朱異，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幅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見《梁書》，卷 43 江子一傳，頁 608。

59 正史記載有朱異當面向韋粲發難事：韋粲「常留宿衛，頗擅威名，誕倨，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異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見《梁書》，卷 43 韋粲傳，頁 605。

60 蘭欽之所以獲升遷為京官，除了可能由於在衡州刺史任上政績出色，父老詣闕請願而上達天聽，還可能由於朝中有重要內應在推動。其中最有可能的內應，非當時權勢極大的朝臣朱異和韋粲莫屬。朱異和韋粲分居左衛和右衛，為在梁武帝身邊出謀劃策的左右手，對於官員的任命和升遷，有極大的發言權，而且與蘭欽都有特殊的交情。

明文，僅稱：

〔蘭〕欽征交州，復啟〔歐陽〕頤同行。欽度嶺而卒，頤除臨賀內史，啟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時湘、衡界五十餘洞不賓，敕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頤為都督，悉皆平殄。侯景構逆，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頤監衡州。⁶¹

從上文可以看出，歐陽頤甚有本領和人緣，接連受到蘭欽、韋粲二位上司的賞識和信任，這二位上司又同是當朝高層同一個既得利益集團中人。而歐陽頤對於識拔他的上司蘭欽，也忠心耿耿，甚至在蘭欽遇害後，他不赴新任，先扶舊主之柩還都。這種品格，使他深受人們器重，也許是韋粲委以重任的原因之一。

檢之於正史，韋粲任衡州刺史的時間極短，而歐陽頤征蠻就發生在這一極短的時間內。據《梁書》韋粲傳載，韋粲於「中大同十一年」授衡州刺史，太清元年（547）「至州無幾，便表解職」。查中大同無十一年，僅一年而已，下年即為太清元年。因此，可以肯定，這裏所謂「中大同十一年」是中大同元年（546）之誤。《南史》陳本紀又載，太清二年（548）冬，侯景作亂，「臨賀內史歐陽頤監衡州」。從以上二條記載可知，歐陽頤討湘衡邊界洞蠻的時間，應在中大同元年和太清元年（546-547）之間。而從「文際滲透」的角度看，上面引文中的「五十餘洞不賓，粲委頤為都督，悉皆平殄」句，亦與《補江總白猿傳》中所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云云遙相呼應，唯年表已錯亂矣。

再看蘭欽，史文中所謂的「欽征交州」、「度嶺而卒」云云，顯然是指上文中所討論蘭欽南下廣州就任刺史時遇毒身死一事。⁶²此事顯然發生在歐陽頤平湘衡洞蠻和侯景之亂以前，因為歐陽頤在蘭欽去世後，才受任臨賀內史；扶蘭欽柩還都後，歐陽頤才南下到任；到任後，才奉命征蠻。由此可見數點不容忽視的關節要害：第一，歐陽頤雖曾參加蘭欽的第二次南征，並有功斯役。但所征的是「俚」、「獠」而不是「蠻」，地點在廣州，而不在湘衡邊界。第二，歐陽頤雖亦曾奉命征討湘衡邊界的五十餘洞的洞蠻，但事在蘭欽死後。而所奉之命，當然也不是出自於蘭欽，而是出自於韋粲。第三，從歐陽頤的這段紀年分明的仕履，可知蘭欽卒年的絕對下限，不可能晚於中大

61 《南史》，卷66 歐陽頤傳，頁1614。

62 蘭欽調任廣州刺史，也許同時有遠征交州的使命。

同元年(546)。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大同末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與中大同元年首尾銜接,在西曆同為546年。《補江總白猿傳》中所謂的「梁大同末」蘭欽征蠻、歐陽紘略地云云,與歷史上當時歐陽顥受韋粲之託南征洞蠻,若合符節。

以上種種歷史事件的大背景乃是人所共知的「侯景之亂」。「侯景之亂」其實可以成為我們研究《補江總白猿傳》中的歷史與虛構的一個坐標,因為與小說中的描寫有關涉的一切史實,都發生在「侯景之亂」之前。侯景之亂前,大同年間,梁武帝「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逾淮、汝,東拒彭城,西開牂牁,南平俚洞」。這些功業,為稍知南朝歷史者所能詳。從上文的各方面分析,可以看出,蘭欽和圍繞他的其他歷史人物所從事的軍事活動都框定在上述梁武帝北拓疆域、南征俚蠻的歷史大背景中。侯景之亂後,南部中國的局面陷入了一片混亂中,朝廷無力再作大規模的北伐之舉,是為一條南朝由盛而衰的明確分界線。如果說,蘭欽的戰功,都在梁代,由北伐和南征組成,而以北伐為重點,那末,歐陽顥和其子歐陽紘的事業則完全建立在他們在嶺南的軍事活動之中,時間上跨越梁、陳二朝。

再看歐陽顥與陳霸先的關係。如上所述,歐陽顥之從一個追隨蘭欽、韋粲的「別將」而逐步成為南方一霸,其關鍵的機緣在於侯景之亂。侯景之亂前,歐陽顥的南征,都是在別人的領導之下,意在平俚或平蠻。而從侯景之亂開始,歐陽顥獨立進行了數次南征,意在平亂,成為衡州的一霸,而其用兵的中心,方圓不離始興地區。這個轉折的關鍵之一,是在侯景之亂以後,歐陽顥投靠了後來以陳代梁的陳高祖陳霸先。⁶³ 據《陳書》歐陽顥傳,在侯景打破梁京建康後,群龍無首,南方軍將自相攻伐,占山為王。歐陽顥轉而靠攏陳霸先,互相支援,積極介入以穩定南方亂局,地點正在始興附近。正史記載:

嶺南互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紹基,奪其郡。裕以兄欽與顥有舊,遣招之,顥不從。乃謂使云:「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為跋扈。」及高祖入援京邑,將至始興,顥乃深自結託。裕遣兵攻顥,高祖援之,裕敗,高祖以王懷明為衡州刺史,遷顥為始興內史。高祖之討蔡路養、李遷仕也,顥率兵度嶺,以助高祖。及路養等平,顥有功,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為東衡

63 關於陳霸先的崛起與嶺南諸豪的關係,近年出版的專著有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州，以顛為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東衡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東衡州刺史，新豐縣伯，邑四百戶。⁶⁴

很值得注意的是，歐陽顛在這裏通過處理與蘭裕（蘭欽之弟）和陳霸先之間的關係時，表現出公私分明、忠義兩全的品質，深為陳霸先所敬，於是才有事後向梁元帝力薦其人的一段故事：

侯景平，元帝遍問朝宰：「今天下始定，極須良才，卿各舉所知。」群臣未有對者。帝〔陳霸先〕曰：「吾已得一人。」侍中王褒進曰：「未審為誰？」帝云：「歐陽顛公有匡濟之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尋授郢州刺史，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衡州諸軍事、忠武將軍、衡州刺史，進封始興縣侯。⁶⁵

力薦的結果，是歐陽顛正式受任衡州刺史，其封地又是始興。

再看歐陽顛與蕭勃的關係。終有梁一代，皇室宗親與外姓重臣輪流擔任衡州和廣州刺史，既有合作，也有對這兩個肥缺的爭奪。時至梁末，歐陽顛進封始興縣侯的前後，政治軍事風雲極為詭譎：

時蕭勃在廣州，兵彊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為刺史。勃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顛別據一城，不往謁勃。勃怒，遣兵襲顛。尋赦之，復與結盟。荊州陷，顛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顛為前軍都督。周文育擊破之，擒送于高祖，高祖釋之，深加接待。蕭勃死後，嶺南擾亂，顛有聲南土，且與高祖有舊，乃授顛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衡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始興縣侯。未至嶺南，顛子紇已克定始興。及顛至嶺南，皆懼伏，仍進廣州。⁶⁶

這段引文中，展示了梁末陳初，梁世宗親蕭勃與外姓重臣陳霸先爭奪嶺南霸業的角逐。⁶⁷ 在宮廷內外權力關係網中錯綜複雜、瞬息萬變的合縱聯橫裏，歐陽顛在夾縫中求生存，成功地站穩了腳跟。⁶⁸ 其關鍵在於他和陳霸先非比

64 《陳書》，卷9 歐陽顛傳，頁157-158。

65 同上註，頁158。

66 同上註。

67 陳武帝微時，仕梁為臣，初僅為嶺南一地方官員，其發跡始之於侯景之亂。「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都護陳霸先起兵攻之，景仲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為刺史。」見《梁書》，卷4 簡文帝本紀，頁105。而後，陳霸先之以陳代梁，經營嶺南，與廣州刺史蕭勃曾相對抗，化友為敵。

68 歐陽顛夾在兩大勢力中間，長袖善舞。他初與陳霸先交厚，後又為蕭勃所驅，抵抗陳霸先，最後再歸陳霸先，左右逢源，有驚無險。《文苑英華》收徐陵代陳霸先所作之《與嶺南酋豪書》，頗能為這段歷史作注腳。其文云：「勃身居列岳，自御強兵，便遣大都督歐陽顛、撫口城主傅泰等凶徒數十，遂到臨川。吾奉承朝算，獲傅泰不勞於一箭，擒歐陽無待於

尋常的關係，而爭奪的重點仍然是始興。毫無疑問，歐陽頎父子不論在平南的功勞上和對嶺南的控制力方面，都大大超過蘭欽。而此時其子歐陽紘已經長成，隨父征討，屢建功勳，並在歐陽頎去世之後，繼承父業，有聲嶺南。通過這些政治軍事意義深遠的南征，在梁、陳換代之際，歐陽頎、歐陽紘聲震嶺南，建立了自己的威望，對於穩定南方的局面，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朝廷眼中，成為一個不可忽略的存在。綜上可見，六朝之世，極講門第，又極講關係。不論是在社稷危亡之秋，還是在歌舞昇平之際，那張意味深長的背景關係網中的各個網結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被聯繫在一起，在宮廷裏和地方上有時互相聲援，有時又互相爭鬥。⁶⁹

但是，一如前述，歐陽紘「余生也晚」，趕不上參加蘭欽的任何一次南征，歷史上參加蘭欽南征並立了功的是其父歐陽頎，事情發生在梁代。不過，歐陽紘成年以後，卻參加過其父歐陽頎主持的南征，並立大功，史稱歐陽父子定嶺南，事情發生在陳代。都是南征，只是有兩個朝代之分，一代之別。

我認為，一代之差的年表錯亂，是這篇傳奇文結構的一個關節點。因為歷史有這樣的巧合，不僅蘭欽有過二次南征，歐陽頎參加了他的最後一次南征，有大功；歐陽頎也有過若干次獨立的南征，歐陽紘參加了他的最後一次南征，也有大功。所不同的是，蘭欽的南征，意在平蠻和平俚。而歐陽頎的南征，並不盡在平蠻平俚。這就是《補江總白猿傳》中所謂：「平南將軍蘭欽南征，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紘略地至長樂」云云的「本事」，不僅把歷史上的陳文徹換成了小說中的「陳徹」，又把歷史上的歐陽頎在小說中換成了他的兒子歐陽紘，再把歷史上的地點廣州換成了小說中的桂林。換言之，狡猾的傳奇文的作者不說「歐陽頎南征」，其子「歐陽紘」如何如何；偏說「平南將軍蘭欽南征」，「別將歐陽紘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使得種種影射圖像，有跡可尋，而一番向壁虛構，又無法坐實。結果是

尺兵。今所擒歐陽頎、傅泰等，莫不弘宥政爾。」具體地說，這場戰役，陳霸先用「周文育南討，剋蕭勃，擒歐陽頎」。蕭勃與陳霸先的矛盾，顯而易見，而其反復爭奪的中心，正是對廣州的控制。歐陽頎搖擺其間，曾一度倒向蕭勃。陳霸先微時與歐陽頎交厚，在歐陽頎這次歸降後，能用人不疑，依靠歐陽頎控制嶺南，屢加其官爵，先進號征南將軍，後又進號征南大將軍，儼然成為嶺南一霸。

69 這張關係網的中堅，實為南朝宮廷中的一個文武兼備的精英集團。

把兩類發生在不同時地、出於不同目的、由不同人物參加的南征，在虛構的層面上重疊起來，創造成一個有自己生命的可射之「影」，以便嵌入那個子虛烏有的白猿故事，技法之高超，用心之良苦，可見一斑。

《補江總白猿傳》的開頭，雖然只用了寥寥四十個字，點出了一個年號、四個人名和兩個地名，我們有理由懷疑，他的胸中是藏有當時整個歷史背景的丘壑的，才會如此揮灑自如，而滴水不漏。

六、「唐人始有意為小說」辨 老調新彈看 《補江總白猿傳》中的史實與虛構

正如本文開首指出，《補江總白猿傳》的篇名，顧名思義，是假定江總曾經寫過一篇題為《白猿傳》的文章。只有在這種情況下，這位匿名的作者才能去「補」其言猶未盡之處，寫作這篇傳奇文。然而，事實上，沒有任何當時人的記載表明，江總曾經寫過什麼《白猿傳》。⁷⁰所謂《江總白猿傳》云云，可能根本就是出於《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的偽託。江總晚年由陳入隋，備受尊敬與重用，《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敢於明目張膽地託名江總，知其必作於江總死後相當一段時間之後。作者的真實目的，我們今天已無從知曉。也許，如學者們所推測的那樣，這篇傳奇文作於初唐末年的武后朝中，極可能與當時歐陽詢之子歐陽通的冤獄有關。也許並不是如此，它只是當時文人嘗試為之的一種遊戲筆墨。但無論如何，其中涉及了「幻設」與「影射」手法的運用。通過這手法，作者在錯亂了年表的歷史中，設置了某種我們今天已無法具體確定的寄託。

因為我們雖然不知道，《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是誰，也不知道他寫作

70 《補江總白猿傳》之所以託名江總，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江總曾收養歐陽詢以外，說不定還可能與江總在侯景之亂前後的經歷和詩賦有關。侯景打破梁京建康，臺城失守，江總輾轉經年才逃到會稽，避居龍華寺，寫下了名聞遐邇的《修心賦》，內有「鍾風雨之如晦，倦雞鳴之聒耳」這樣的佳句。在同一賦中，江總有「山條偃遠，水葉侵淫，挂猿朝落，飢鼯夜吟」之句，描繪會稽龍華寺的山景，落墨於「猿」。其中的境界，我疑其總體地啟發了《補江總白猿傳》的創作。此外，賦中「非木落而悲始」之句寫的是龍華寺前的秋景和詩人的瞬間感受，這裏極可能啟發了《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把它移花接木地變化作傳奇文中白猿臨死前在山間的悲嘆，即所謂「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云云。

的具體動機是什麼；但可以肯定地說，此人非常熟悉梁、陳間的歷史，抓得住歷史發展的脈搏。在侯景之亂以前，梁代自天監至大同，連年與北朝交戰，互有勝負。而有梁一代，最重要的經濟舉措之一是開發嶺南。本文提到的蘭欽北伐，只是對魏用兵大背景中的小插曲。同時，蘭欽的征湘、衡洞蠻和廣州叛徠，韋粲和歐陽頎征湘、衡洞蠻，以及歐陽頎、歐陽紇南征交、廣，又都是開發嶺南大潮流中的小浪花。經過上述的南征和北伐，梁的疆域和戶口都大大擴展，而於中大同元年（546）達於鼎盛。這裏的一切，都經過融會貫通，有組織地被幻設在《補江總白猿傳》開場白的四十個字中，層次井然。看來，通過年表的錯亂，作者在暗示讀者，傳奇文中故事的真實性，在有無之間。

由此推測，這位「無名子」也許置身於當時宮廷的核心文人圈內，否則便無法接觸到當時修成不久的南北朝各正史，或這些正史據以成書的「行狀」和各種史料。初唐之際，印刷術尚未發明，史書流通依賴手抄，範圍有限。初唐有機會接觸新修南北朝正史者，非圈中人不能做到。而一讀到《補江總白猿傳》，便能通過「文際互證」去聯想到正史列傳中有關文字者，更非當時宮廷的核心政治圈中人不能為。根據我正在作的研究，目前我們看得到的三篇初唐傳奇文——《古鏡記》、《補江總白猿傳》、《遊仙窟》，都是為圈內人而創作，為圈內人所利用的。換言之，傳奇文之在初唐，也許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文字，流傳在特定的宮廷圈子內，有其不能被取代的特殊通訊功能和政治功能。⁷¹

與「年表錯亂」相對應，《補江總白猿傳》又採用了「文際互證」之法。我個人認為，此法亦為傳奇文寫作核心章法之一，使史實化為故事的過程，得以在一個約定俗成的文體框架中完成。仍以同篇傳奇文為例。具體地說，《補江總白猿傳》是被有意安排在一個特定母題的骨架之中的。眾所周知，《補江總白猿傳》母題的源頭，乃是《焦氏易林》中的「南山大獲盜我

71 關於中唐傳奇在當時文壇和社會中的功能，中外學者多所探討，莫衷一是。最新的研究有小南一郎之文，頗有啟發性，見 Kominami Ichirō, "T'ang-Dynasty *Ch'uan-ch'i* Stories: From the Narrative Locus to the Written Work," *Acta Asiatica* 82 (2002): 1-17。然而，我個人認為，初唐之傳奇，在當時文壇和社會中的功能，與中唐既有相同又有相異，不宜籠統地一概而論，亟需作專門的研究。

媚妾」寥寥八字。這個母題經過在張華《博物志》和干寶《搜神記》的「獬國馬化」故事中發展成形，變成了一個俗套，或者說一個廣義上的典故。《搜神記》云：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獬國。一名馬化。或曰羆。伺道行婦女年少者。輒盜取將去。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則為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及長。與人不一。皆以楊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姓楊。率皆是獬國馬化之子孫也。⁷²

《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正是利用了這個約定俗成的母題，構成了故事的內在骨架。

先選定一個母題的骨架，再往上敷施色彩，也是唐人傳奇文寫作的不二法門。一方面，《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傳奇文的開頭和結尾注入了錯亂了年表的歷史血肉，用時序顛倒的史實拼接成《補江總白猿傳》中的一首一尾那個歷史的框架。另一方面，他又在傳奇文的主體部分敷上了一種出世仙鄉的色彩。它是流傳於中古的「入山遇仙」規定情境中的一個變體。它同時又是六朝至唐代十分盛行的他界小說結構中的一種副型，這種副型日本學者稱之為「仙鄉譚」。在這種副型中，讀者會看到，故事中有個「歷史框架」和「虛構境界」的對比，其實是仙鄉與塵世兩個世界之間的對比。虛實兩個世界的並存與對照，在中國中唐到明清的各類舊小說中比比皆是，而《補江總白猿傳》是一個早期的重要例子。

雖然二者看來風馬牛不相及，我總覺得《補江總白猿傳》與《太平廣記》中所收那個著名的六朝劉晨、阮肇入天台故事，在規定情境的間架上，十分相似。

我們不妨把兩者的行文骨架作一個比較，便知大概。《太平廣記》載：

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遠不得返。經十三日饑。遙望山上有一桃樹子熟。遂躋險攀緣葛至其下。欲下山。以杯取水。見蕪青葉流下。甚鮮妍。復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飯焉。乃相謂曰。此近人矣。遂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曰。何來晚耶。因邀還家。南東二壁。各有絳羅帳。其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美。酒酣作樂。夜後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

72 今人輯逸《搜神記》，文多據《太平廣記》。轉引自宋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444，頁3629。

年。氣候草木。常是春時。百鳥啼鳴。更懷鄉。歸思甚苦。女遂相送。指示還路。已十世矣。⁷³

我們對照《補江總白猿傳》中有關的對應描寫，就會發現二者在仙境的構思與布局、設色與裁剪等等方面，都何其相似。為了便於說明問題，下面將《補江總白猿傳》中的有關筆墨引出，對照比較：

歐陽紇 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迴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渡 捫蘿引緬而陟其上 有東向石門，婦人數十，被服鮮澤，嬉遊歌笑入其門，以木為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床，悉施錦薦 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 及晚必歸 夜就諸床戲，一夕皆周 搜其藏，寶器豐積 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色，久者至十年。 紇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偕歸，猶有知其家者。

這裏，影射、幻設、年表錯亂和文際互證就成了傳奇文未能或缺的章法要素，藉含沙射影之法，假借歷史之酒杯，以澆現實的塊壘，其筆法之迭宕、落墨之精心，令人贊歎。而凡此種種的章法，後來都在中唐傳奇文創作的黃金時代裏發揚光大，形成了自成一體的所謂傳奇體。⁷⁴

七、沒有結束的結束語 初唐傳奇文的 跨學科文化歷史研究

行文至此，本文的「緣起」中所談到的各個重要問題 《補江總白猿傳》作於何時？它究竟出於何人手筆？這個作者又是出於何種具體動機來寫作這篇謗書性質的傳奇文的？⁷⁵ 又一次自然浮現在我們面前。雖然自上世紀中葉以來，幾代學人多方訪求推測，終於無法在傳世的文獻中，找到任何硬證據，來確切地回答以上屬於「作者意圖」(authorial intention) 範疇的問題，本文自亦不例外。本文通過對於《補江總白猿傳》的「年表錯亂」所作

73 見《太平廣記》，卷61，頁383。

74 今人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成書者有董乃斌所作《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其他研究大多散見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各種學術雜誌。

75 從以上的細讀式分析中，又引出了一系列更大的問題，有待解答。比如，唐人在其說故事文化中，究竟如何看待虛實的分野？用筆記和傳奇講述歷史的故事時，允許多大的虛構範圍和程度？

的考據，其目的並不在於（也無法做到）具體坐實上述種種推測。

我目前的一系列研究，旨在通過寓文本於歷史背景中的跨學科方法，來試圖至少部分地重建《補江總白猿傳》創作時的歷史環境。簡而言之，在初唐之際，開始有作者用「年表錯亂」的幻設方法，來作改寫歷史的試驗，這種改寫試驗的中心環節，出乎某種影射現實的動機。這種動機，不管是惡意的攻擊或是隨意的遊戲，都提供了一個能夠融會文本中史實與虛構的軸心。這個軸心按照一定的章法而運轉，形成唐代傳奇文的重要特色之一。本文的目的在通過分析《補江總白猿傳》這樣一個早期的樣本，用一斑以窺全豹，研究作者是如何經過章法的運作，來「有意為小說」的。

The Displacement of Historical Facts in the Text of *Bu Jiang Zong baiyuan zhuan*

Jue Chen*

Abstract

Bu Jiang Zong baiyuan zhuan 補江總白猿傳, a masterpiece of the early-Tang *chuanqi* 傳奇 fiction, was written by an anonymous author whose identity has yet to be uncovered. The anachronism found in the tex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converting the historical facts into a fictional account. In the text, th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history and fiction are systematic. It resembles a labyrinth with an inner structure in which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and creative fictionality shift back and forth. This is achieved through a complex system of displacements and replacemen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anachronism in *Bu Jiang Zong baiyuan zhuan* is more likely an intentional method of composition rather than the result of careless mistakes. The practice of interweaving non-fiction and fiction into the same text suggests that the author was attempting to establish a referential framework for the story.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mechanics of intentional anachronism in *Bu Jiang Zong baiyuan zhuan* is conduct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result will become part of a larger project that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chuanqi* fiction as a whole.

* Jue Chen is a lecturer in Chinese at the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New Zealand.

Keywords: *Bu Jiang Zong baiyuan zhuan* 補江總白猿傳 (Supplement to Jiang Zong's *Biography of a White Ape*), early-Tang, *chuanqi* fiction 傳奇, intentional anachronism,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